



从“第二个结合”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郭冰清^a, 沈正赋^b

(安徽师范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新闻与传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 “第二个结合”是引领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纲领, 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打开了创新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意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高度契合性。基于“第二个结合”的视角, 从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三个维度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简称“两创”)。从必要性来看, “两创”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文化认识发展规律的深化、文化立场观点的贯彻和文化价值理论的实现; 从可能性来看, “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了“两创”的文化形态, 并依托中国特色的天然基底, 在新时代已产出新内容的显化成果; 从现实性来看, 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实现“两创”的实践进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个结合”;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12-0666-09

Perspectives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second integration"

GUO Bingqing^a, SHEN Zhengfu^b

(a. School of Marxism; b.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erves as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eline for lead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opens up innovative spa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Marxis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ferred to as the "two creations")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discus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necessity,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In terms of necessity, "two creations" represents a deepening of understanding of law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mplementation of cultural positions and viewpoints, and an achievement of cultural value theory in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In terms of possibility, the new cultural life form created b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has formed the cultural form of "two creations", and with the natur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produced visible results of new content in the new era. In terms of reality, promoting and deepen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to achieving "two creations".

Key words: Marxist cultural theori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习近平强调:“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1] 文化传承与创新在新时代是具有原则高度的使命。“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引,由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进一步将“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命题阐释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3][8]}。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互成就的内在可能性。从“第二个结合”视角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正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观点,阐释其传承创新的内在机理与行动路径,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有效运用。

当前,学界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是内涵阐释,涉及生成逻辑、哲学基础等维度。张红飞^[4]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将其生成发展划分为批判总结、调整建设、相互依存、互动共生四个阶段;张岩磊^[5]提出其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本体,在自发与自觉的辩证统一中实现自我扬弃与发展;张瑞涛^[6]则认为其哲学基础体现在矛盾、真理及社会存在与意识关系的辩证原理中。二是价值意蕴,围绕创新性贡献、思想解放意义等方面。刘同舫^[7]指出,“第二个结合”在反对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层面,巩固并提升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夏巍等^[8]认为其既是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实践纲领,更具备“原则高度”;梅荣政^[9]强调其将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提升至党的创新理论原理高度,明确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为增强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作出巨大创新贡献。现有研究中,关于“第二个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多集中于二者的契合性,如孙明霞^[10]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在求实传统、矛盾观点、知行关系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高度契合。综上,学界已对“第二个结合”作出充分深刻的阐释,也涉及中华文化、文明等相关话题,但尚未聚焦从“第二个结合”视角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从相关研究可见,“第二个结合”与“两创”存在深刻内在关联。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为起点,推动二者相互成就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在理论逻辑上为“两创”

夯实前提、明确方向;而“两创”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以深度化学反应催生新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在实践逻辑上为“第二个结合”提供行动方法与实践路径。简言之,“第二个结合”解答“为何结合”“结合什么”,“两创”回应“如何结合”,二者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从逻辑起点到价值落点的客观呈现,共同构成新时代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路径。基于此,本文从二者的深刻关联出发,以“第二个结合”为视域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旨在为“第二个结合”在文化领域的深入推进及文化创新空间的拓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人文和实践的沃土,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要充分发挥“第二个结合”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首要任务便是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它并非简单等同于传统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反复提炼、精准鉴别后,在推动人类社会进程仍具价值意蕴的部分,是传统文化里的精华与优秀基因所在。新时代以来,挖掘、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党中央通过重大会议、政策文件对其内涵予以定义,习近平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治国理政理念,进一步丰富、归纳相关内容。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是推动“第二个结合”深入开展的关键。只有明晰其内涵,才能在文化建设中精准发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全新文化成果助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内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已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三个组成部分。核心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思想观念。地理和人文因素造就的生活环境对人们如何观察世界、制定处事准则有着巨大的影响,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这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铸就的,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表述中。如“实事求是”的命题来源于《汉书》中的“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这一经典表述最初被用来批评和反对古文经学中不切实际的弊

病,后经不断改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今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富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本思想早在管仲时期便有阐释,《管子·治国》中“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至上的立场根本一致,可见以民为本是中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天人合一”理念在《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得到体现,具有深刻的生态文明价值,与当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倡导和谐共生的理念不谋而合。这些思想理念虽带有时代痕迹,但经过不断改造发展,至今仍适用于社会现实,是新时代价值观念形成的文化根源。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印有中国人民性格底色的道德规范,习近平将其评价为“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11],涵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多个层次。比如,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仁爱精神,体现了社会成员乐于助人的社会公德;敬业乐群、见利思义,展现了认真对待事业的职业道德;尊老爱幼、孝老爱亲,则彰显了爱护幼童、孝顺老人的家庭美德。这些道德规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涵养气度、约束行为、提升修养的优良传统,在当今社会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意义重大,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优秀思想资源。

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总结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蕴含着东方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独特智慧、气度和魅力,最终浓缩在多样的教育思想、审美追求、人生理念中。其中广为人知的,如敬畏生命、重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人本精神,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交流互鉴的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以及追求自身修养、讲究“向内求”的人文修养,可整体概括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以德为本的人生观,以和为本的价值观”^[12]。中华人文精神包含大量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优质思想文化内容,为提升中国人民的精神境界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滋养。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内容折射着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观察世界的立场和方法,“形成了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13],这些价值体系反映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集中体现在人们长期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中。

宇宙观源于中国人民与自然界的长期相处。从最初的畏惧自然到逐渐适应自然,人们不断深化对周遭世界的认知,以找准自身在世界中的定位。由此形成了诸多深刻观点: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集》)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则强调道法自然——即探寻、尊重并利用自然规律以推动革故鼎新。

天下观始于中华大地上独有的“天下”概念。“天下”一词总体包含三方面含义:“第一是地理上的;第二是制度上的;第三是价值上的。”^[14]天下观是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看法,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局观、整体观,以及自古代便培育形成的大历史观与大格局。例如,“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展现出胸怀天下的非凡气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司马法·仁本》)彰显了以和为贵、倡导和平的外交理念。这些都是天下观的重要内容,在当下对于中国处理与世界及他国的关系、提升国家和人民的站位与认知,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社会观根植于中国人民对美好世界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礼记》中对大同社会景象的描绘,堪称中国人民规划未来社会蓝图的萌芽。从那时起,人们对社会观的理解,便多与对“天下大同”这一远大社会理想的向往紧密相连。其中,尊重民生的社会治理理念、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运行状态、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观的主要内容。

道德观则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伦理道德的核心理解,体现为人们对待周遭人和事的方法与准则,集中彰显了中国人民高尚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如《礼记》中的“止于至善”点明善是人间最应具备的品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通过修炼自身品德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论语》中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强调做人应心怀坦荡、无愧天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则提倡人们时刻督促自己提升道德修养。这些道德观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人民立身行事与思考方式的智慧结晶,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资源。

二、从“第二个结合”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何以必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内涵丰富的思想资源体

系,对其理论内涵的基础概括与分类,仅是其庞大内容的冰山一角。其中诸多智慧理念,即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学习与借鉴价值。习近平明确指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5]20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底蕴,决定了对其的挖掘、转化与创新将长期处于“进行时”状态。而作为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第二个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视角出发,首先阐释了“两创”的必要性。

(一)“两创”是对“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化

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生相伴,马克思在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没有直接提及关于文化的理论和思想,但是他在创立和阐释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通过对文化本质的把握探索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6]524} 思想、观念、精神交往等表述都是文化的原初表达形式,马克思清晰地指出观念和精神等意识产生于社会物质生产和交往。在考察原初历史的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他又深化了这一观点,提出满足历史最初的生产活动后发现意识的存在,“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16]533}。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交往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分工的出现,意识有了相对独立性,即“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可以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6]534}。这使得文化的形成、艺术的创作等成为可能。文化作为意识的一种类型,更多是被马克思恩格斯置于精神生产的视角下考量。虽然马克思强调了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最根本的决定力量,但他并没有忽视文化本身的功能。恩格斯也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17]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所有可能里,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合力,其中就包括文化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

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8]

马克思对文化的阐释,主要立足文化的本质与作用:文化的客观属性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受社会现实制约和影响,同时又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反作用,“优秀先进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腐朽落后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19]厘清“文化是什么”以及“文化有什么作用”,是明确文化发展路径与方向的前提。随着时代前进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社会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社会关系更趋成熟,社会交往愈发广阔深入,实践活动与精神需要也随之改变。这决定了新的文化形式与内容必须适应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新需求。“两创”正是在此背景下,挖掘传统文化中至今仍具借鉴意义、契合当下价值观的优秀基因,对其内容与形式进行现代化改造,打破旧有框架,赋予全新内涵。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对“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化与运用。依据中国社会实践的巨大变化调整文化形式与内容,使其成为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新时代文化,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提供奋斗中的思想指引,更能充分发挥文化的反作用,以新文化凝聚人民群众建设祖国伟大事业的精神动力。

(二)“两创”是对“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观点的贯彻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性是文化的显著特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16]550-551}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被深深打上统治阶级的思想烙印,这是由文化的本质和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此外,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都不断凸显,“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趋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6]540-541}一切事物都将由封闭走向开放再走向融合,文化的民族性、独特性也将渐渐拓展为世界性、共同性。

不难看出,马克思由文化的本质和特点衍生出关于文化立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发展代表人民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文化,还要在世界洪流的交流互鉴中既兼收并蓄又保持民族特色,即对文化人民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坚守。中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出发发展中国先进文化。人民至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定立场,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鲜明立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创作代表人民群众的先进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建设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发展人民大众的文化、先进的文化,营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构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先进文化建设”^[20],既符合中国国家制度的性质又符合人民群众真切的精神需要,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立场中人民性的深入贯彻。在“两创”的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话语创新的源头之水,是建设中国特色学科话语体系的理论根基,更是顺应文化建设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宝库始终源源不断地为形塑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提供理论和动力支持。因此,只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转化和创新,才能更好地让它扎根成长融入新时代,成为中国人坚定自我、发展自身的利器。立足现实深度交融的世界历史格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改造和创新,就要将优秀基因和积极思想融入当代文化建设的考量,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立意的升华和内容的充实,既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成果,又着眼塑造属于中国风格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在创新的过程中用充分的底气和自信面向世界舞台,坚持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立场,有助于激活文化底蕴、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坚守社会主义国家的底色,“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1]85}。

(三)“两创”是对“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理论的实现

文化对社会的反作用决定了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使命。由于文化具有阶级性,马克思对文化的解读也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6]552},并且在虚幻的共同体中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6]552}。从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致力于打造思想统治体系的观点中不难发现,文化在

塑造民众的社会人格方面有着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价值以及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功能。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2]人格的完整和自由、精神的自主和解放是文化发展的价值指向,优秀的文化同样也会转化为迈向自由的坚强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对意识的精妙比喻,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群众。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6]11}文化在对群众的传播和影响中,给社会带来与物质力量同等重要的影响力,而文化如何掌握“根本”,就是要紧密联系不同时期的社会实际情况和人们的现实需求,这是文化能否转化为物质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钥匙。

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文化对人格的启迪作用和转换为物质力量的可能为出发点,强调文化在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的属于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标志,与中国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同根同源,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全面发展和精神彻底解放的最大底气。与过去马克思谈及的那些充斥着“虚假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潜移默化的精神内存是每一个中国人成长过程中的根,没有哪一种文明比中华文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没有哪一种文化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机会和可能成为促进人自由发展的精神力量。“两创”要求深层次挖掘、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并在此基础上补充、拓展和完善新内容,不忘来时之路才能开启未来之路,让原本深邃久远的内涵变得清晰立体,并且富有更深厚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形成和产出属于人民群众自己的、符合人民群众精神需要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需要的文化,实质上是一场提升中国人民对历史传统的自信、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的精神洗礼。以文化自由、繁荣增进人民群众对迈向美好生活和实现全面发展的自信,是对“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充分把握和积极实践。

三、从“第二个结合”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何以可能

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

高度。”^{[3]9}“第二个结合”充分打开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空间,帮助其推陈出新“开自己之生面”,不断扩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意义和影响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之义”拓展为“世界之义”、将“中国之道”发展为“人类之道”,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全新文化形态

习近平阐明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力量和新起点上的文化使命,提出造就一个中国式现代化形态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第二个结合”中,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深刻的化学反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果的产出,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中国人民在现实中抵御风险、迎难而上、孜孜以求的精神壁垒,是国家和人民在深刻复杂的世界形势中能够行稳致远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1]209}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顺利实现内容再造和意义再增,重焕生机活力以实现文化复兴,离不开“第二个结合”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积极渗透和融合;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明基因的重塑和再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丰富和充实。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段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在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处于根本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规律中的丰富内涵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一直是中国人民建设伟大祖国的根本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从唯物史观基本规律的探索中衍生出来的关于文化本质和演进规律的总结。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方向,就是在文化建设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数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春风化雨般绵绵不断地为中国人民的前进和奋斗提供精神引领,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涵养着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和世界格局。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契合的价值观念和优秀文明基因,是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支撑。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也强化了信仰底色与中国特色标识,为文化创新

规定了宏观方向,即“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2]。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层面就是要建设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精神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二个结合’恰恰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打开了通道,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中的杰出元素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中重新激活,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23]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表明在“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中,文化领域已经孵化出新的生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和时代因子、科学因子的融入下,新的文化形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造和超越创造了框架和形态、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在坚守“魂脉”、保护“根脉”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占领新的思想高地。

(二)中国特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天然基底

“第二个结合”的文化自觉性和文化主动性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地位的高度强调。要在文化这口深井中开发藏于深处的中国特色,就要正视中国特色的源头之水是独有的五千年悠久文明这个客观事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发源地,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跃升的纵深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的独有理论底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的内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标识,更是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深厚基底和强大底气。“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时空生成和存在场域,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的社会状态的表达形式。”^[24]文化生成的时空和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文化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着指导中华儿女应对和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国家、人与财富、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国家与世界关系的内在基因和密码”^[25],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深刻的印记和最重要的底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伦理规范、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观点和理念是古代先贤历经朝代更替、国家兴衰归纳出的对国家发展和个人成长的经验总结,是独属于中国的治世和修身法则,是与西方理论体系远不相同的精神话语。如过去形成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的治国智慧到今天传承为人民至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场和政策,与西方用资本垄断控制一切、只有形式民主没有实质民

主的现状全然不同;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理念到今天演进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落实,与西方牺牲自然换取利益的无序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传统到今天进一步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观念,与西方各自为政、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风气迥然不同。这些伟大的中华民族智慧,饱含中华古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特色,传承数千年至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展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民族立场,映射出的是现在和未来植根于中国文化根基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这些独属于中华民族的“原创性内容”是历史画卷中最亮眼的一笔,也是文化发展中天然、深厚的内容基底,对中国特色的继承和依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关键之招。习近平强调主体性是文化立得住行得远的必要条件^{[3]8},在创新过程中要珍视、爱护这些具有高昂的民族主体性的理论内容,需要在充分挖掘和理解“原创性内容”的基础上改造形式和丰富内容,让旧内容穿新衣、旧观念有新意,使中国特色的文化在当代“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26]。面对今天的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语境,用文化创新的成果传递中国在发展中的感悟和启示,对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提炼中国答案、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图景中书写中国画卷,这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使命。

(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显化成果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3]8}，“第二个结合”更是探索未来文化创新的有力武器。面向未来和新时代,坚持产出既富有中国特色又适应当下世界大态势的新的文化内容,为坚持中国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夯实稳健的文化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其中不管是对国家、社会还是个人层面的观点都有经得起历史和人民考验的优秀的内容,在今天进行文化创新就是要将这部分已经经过文明传承、历史筛选的内容再进行时代的改造和人民群众的雕琢,使其成为新时代引领国家和人民前进的精神旗帜。其中一些经典内容放至今日虽然整体上仍有使用价值,但是由于他们产生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与现在相比有着巨大差异,古代智慧不能仅仅平移至现代使用,“一旦脱离了实践语境,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不可能逃避被抽象化的命运。”^[27]要使传统文化焕发出现实价值避免因与时

代脱节逐渐抽象化,关键是要结合当代实践基础在新语境和新时代创新表述和提法。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刻的内心感悟,常常在阐释治国理政的方略中引经据典,将古代文明的智慧转变为今天谋发展谋幸福的体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习近平多次在不同会议上提出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方针,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这表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发挥作用。

2023年正式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新内容巧妙融入理论品格与实际内涵,以贴合新时代语境的创新提法,重新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例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传统思想表达为“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将包容、和平的文化发展思想表述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后花园”,将“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进一步定义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的充满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特征的社会理想等具有时代化的表达方式,“使传统文化资源回应当代现实问题,包括形成新的文明内涵、呈现新的表现形式、体现新的价值特征等”^[28]。这些新的表达方式并不是用新瓶装旧酒,而是将古代文明的智慧结晶更新为更适合当下社会现实状况的、更贴近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更能够面对世界复杂形势的精神成果。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壶愈久愈醇的美酒贴上时代的新标签拥有时代的新风味,在本质上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建构传统话语的价值,凝聚中国人民对于家国的情感认同和共同奋斗的价值认同,能够“走向更为宽广的时空,在一种时空的延展中传承其生命的活力,在一种已经变化的环境中去‘别开生面’”^[29]。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精心布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产出新内容破除障碍。习近平文化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顺势而生,这不仅是对“两创”的生动实践,更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内容的有力彰显。

四、从“第二个结合”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何以成就

习近平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6}在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

代的”^{[3]6},这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成就的有机过程,从而产生和形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形态的新文化。在理论条件和现实环境都已具备可能性的前提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作为着眼于“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实践,必须通过在现实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路径才能真正实现。

(一)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是我们的看家本领。”^{[15]34}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文化本质、作用、立场和价值等方面的重要观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导的过程就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

首先,“两创”的实践要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审视为起点并且贯穿始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方面内容上有共通之处,在此前提下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理念、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等思想精髓,以二者的高度契合之处为着力点找出准确的结合点,推动彼此深度交融,继而生发出新的创新点。在这个过程中,要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为框架和方向。

其次,“两创”的成果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尺度为落点。“第二个结合”本意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这不仅体现在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握文化在社会发展和实践中的具体位置和作用,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方法科学地、辩证地构建文化创新的形态,更体现在要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和检验文化创新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富含中国特色的精神标识,其创新和发展的最终成果应该是中国人民独有的精神产品。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因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彼此融合,就要充分明确“两创”的最终目的,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以产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优秀文化成果度量当下的创新实践,创造真正为人民群众喜爱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文化。

不管是从起点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还是从落点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尺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都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实质上是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与在文化领域的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这个结合

的过程意味着“两创”必须以力争形成新叙事加强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达为现实路径,在深度融合中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文化主体性,在此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刻画和雕琢新文化,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

(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都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时俱进的,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问题的变化吸收新内容、展现新特点、孕育新表达。如前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的主要来源、是不可丢弃的“根脉”,是文化创新得以进行的前提、基础和“可能性”。在“两创”的过程中,不仅要时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同时也要积极地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首先,要在“第二个结合”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时代困境驱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给出新答案。“两创”在形式和内容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创新,本质上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型。因年代久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导致在新时代转型面临重重困境,这是时代抛出的新问题。“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突出问题导向是科学实践观的现实前提,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30]用新问题驱动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回答时代之问,用“问题倒逼”的模式实现“自主擘画”的图景,在方法论层面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实践的考验中交出满意的答卷。

其次,要在“第二个结合”中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生命。“两创”的本质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互交融中铸就文化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开拓创新的主动精神结合时代要求,赋予自身思想精髓和文明价值以时代的厚度和深度,在吐故纳新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用新时代的视野和认识持续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注入新的内涵,使其生命“活”起来,形成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科学真理。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通过更新其生命力让其在新时代焕发真理光彩,正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带动马克思主

义文化理论时代表述的生成。基于此,“两创”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问题为导向、以当代价值为主线,用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科学内涵展现出更强的时代适应性,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创造出符合中国特色、反映时代面貌的新文化和形态。

五、结 语

本文从厘清“第二个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内在关联入手,探讨了该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两创”的理论内涵,并进一步阐释其实践进路。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并非处于静止状态,而是持续发展、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学界应聚焦文化创新方向引导、平台扩展、渠道丰富、内容打造等重点领域,紧扣时代主旋律,依托国家政策、人才、技术等优势,深入研究“第二个结合”如何在现实层面拓展创新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如何落地实操等问题。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彼此成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发展思路,是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相统一。当前在“两个大局”的历史坐标中,如何在应对世界变局中提高文化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文化的深厚力量和深远影响,是坚持中国道路、抢占发展先机、发展精神文明的关键。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今后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在此基础上积极促进文化新样态新范式的形成,以文化繁荣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底气和软实力,同时在世界现代文明图景中复现中华文明的伟大魅力,用中国智慧助力创造人类文明美美与共、共同发展的全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 人民日报,2024-10-29(01).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4] 张红飞. 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J]. 东岳论丛,2023,44(6):20-27.

- [5] 张岩磊. 论“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内涵及其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0):37-48.
- [6] 张瑞涛. 论“第二个结合”的哲学基础[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5):24-34.
- [7] 刘同航. “第二个结合”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J]. 思想理论教育,2024(1):4-10.
- [8] 夏巍,高伦. 论“第二个结合”的原则高度[J]. 贵州社会科学,2024(12):28-34.
- [9] 梅荣政. 论“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创新性贡献[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9):1-11.
- [10] 孙明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在哲学视域中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前提[J]. 贵州社会科学,2024(2):21-28.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 [12] 胡钰. 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传播[J]. 当代传播,2022(2):4-10.
- [1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406.
- [14] 干春松. 儒家“天下观”的再发现[J]. 探索与争鸣,2019(9):116-121.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4.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 [19] 段虹,孙向宇.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与创新[J]. 东岳论丛,2024,45(6):5-11.
- [20] 黄意武.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J]. 学习与探索,2024(9):26-33.
- [2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15.
- [23] 黄子莹,孙建华.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逻辑及价值意蕴[J]. 江苏社会科学,2025(2):28-35.
- [24] 张广俊.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时代样态与拓新路径[J]. 云南社会科学,2024(6):146-154.
- [25] 邓莉.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J]. 山东社会科学,2025(1):94-100.
-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52.
- [27] 何中华. 重读马克思[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99.
- [28] 汤筠冰,吴泓静.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3(1):126-137.
- [29] 林进平. 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哲学动态,2025(1):5-20.
- [30] 董浩然. 何旨、何谓与何为:“第二个结合”的认识飞跃与创新新发展[J]. 思想教育研究,2025(5):129-136.